

唐五代养子现象略论

拓天梅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收养假子的现象本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宗族继承思想,唐五代时期,不少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这一特殊的亲缘关系来笼络人心、扩大势力,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收养假子之风。这种养子关系大都是因利而合,所以会引起争权夺利的争斗厮杀,但是也不乏舍身相救的忠贞之士。这样的一种复杂的关系不但影响着他们自身的成败,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即加快了改朝换代的进程,又阻碍了新王朝实现大一统的步伐。

【关键词】养子;来源;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K242;K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3-0089-03

唐五代时期,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政治混乱,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各种势力此起彼伏,逐渐不受朝廷管辖,反而拥兵自重,蓄意扩张势力,互相讨伐。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个节度将领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相收养各种勇猛善战、聪明机智、有一技之长的军事人才,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收养假子之风。出现这种情况是有根据可寻的,并不是偶然出现。

一、唐五代养子来源

虽然血缘关系是古代社会宗法制的主要标志。但是,据史书记载,古人收养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唐以前主要是以收养同宗子女为主。例如:“(张)贺有一子早死,无子。子安世小子彭祖”^{[1]b2651}(贺乃安世之兄)。“元常,广郡令常良女,适广汉便敬宾,早亡。元常无子,养宾族子”^{[2]b139}。诸葛亮以兄子乔为嗣并立为嫡子^{[3]b363}。不过,也有许多人收养异姓为养子。例如:汉末三国时期,曹腾养曹嵩为子^{[4]b2}(曹操之父嵩,本是夏侯氏之子,后来被宦官曹腾收为养子,而改姓曹,曹操也从其父而姓曹)。“封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5]b386}。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古人收养子女多半是因为无子或无生育能力,所以就通过收养同宗或异姓子来弥补这一缺憾,进而达到继承香火、传爵继产的目的。而且,古代君王大都以孝治天下,汉朝时期实行察举制,其中有一项就是“举孝廉”,而孟子也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6]b13},同时又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6]b167}。对于古人来说,生儿育女,既是延续家族家庭血脉的需要,也是老年生活的需要与支柱。如果有子女夭折或者无生育能力者,唯有通过这一方式进行弥补,所以

收养假子这一现象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唐五代收养成风,究其根源,更多的是来源于人们养儿防老的天性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只不过唐五代时期由于现实的需要,人们收养的企图与目的都有所变化,与古人大有不同。

有学者认为,唐代养子之风盛行,是来源于北方胡族的落后习俗。但是据史书记载,北方少数民族虽然有“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5]b1864}的恶习,但是,隋唐时期,突厥在确立其首领继承人的人选上“常以可汗子及宗亲族为之”^{[6]b5179}。汉代时,羌族人就有了“杀首子以荡肠正世”^{[11]b4020}的习俗。师古曰:“荡,洗涤也。言妇初来所生之子或它姓。”这种行为正是害怕继承者的血统不纯洁的表现,所以胡族虽然“妻其群母及嫂”但是不会影响血统的延续。所以五代时期的收养风的根源并非全部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落后习俗。

二、唐五代养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

《新五代史》中有语“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7]b385}既然是“以利和而相资”,那么养父子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了。即便是亲父子兄弟也会因为利益而互相残杀,众所周知的玄武门事变,太宗为秦王时便战功赫赫,太子李建成怕太宗会威胁到自己的帝位,于是便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6]b29}唐末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囚禁,守光自称留后,长子刘守文听闻父亲被弟囚禁以后,便发兵讨之,被守光杀害,正

收稿日期:2014-07-15

作者简介:拓天梅(1988-),女,汉族,甘肃环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社会史。

像书中所描写的：守光“以父兄失势，谓天所助”^{[18]1803}。还有五代时期靖难军节度使杨崇本“为其子彦鲁所弑”^{[17]139}。还有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杀害，原文描写及其残忍“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18]109}。既然亲父子兄弟之间杀戮已成常见，那么这一时期的养父子兄弟之间的争权夺位，互相残杀背叛也在所难免。除了以上所说的杀害养父兄夺位的事例外，还有，凤翔李茂贞因战失利，惧怕昭宗，将曾经“矢及帝胄”的养子继鹏杀死，“传首以谢”^{[19]5438}。后唐明宗养子元行钦，元行钦本是幽州刘守光的爱将，后与明宗交战失利被迫投降，明宗养为己子。后来，“赵在礼反于魏”，庄宗先遣元行钦击之，未克。又遣明宗，明宗至魏，与赵在礼合。后庄总曾两次遣明宗子李从璟召回明宗，被元行钦击杀。后明宗即位，执元行钦。“骂曰：‘我儿何负于尔！’行钦瞋目直视曰：‘先帝何负于尔！’乃斩于洛阳市，市人皆为之流涕。”^{[17]272}元行钦虽然击杀养父之子，后又被养父所杀，但是其忠君勇气可嘉，赢得了市人的同情与叹息。还有杨复恭养子守立，昭宗“政事多访于宰臣，恶复恭……惧守立为乱，乃谓复恭曰：‘吾要卿家守立在左右，可进来。’乃赐姓李，名顺节，恩宠特异，势侔权要，乃与复恭争权，每中伤其阴事。”^{[16]4774}守立“权勇冠于六军”，但是，一旦具备条件之后。便于养父复恭争权夺利，而且还常常诬蔑复恭，可见养父子关系恶劣之时，轻则相互中伤斗争，重则可至杀身夺权之祸。但是，并非所有的养父子关系都是如此紧张。也有视养父如亲父，视养子如亲子，视养兄如亲兄弟的忠烈之士。例如：杨复恭因被人诬告与守信谋乱，昭宗遣兵拒之，复恭兵败，为华州兵败，“执送京师，皆梟首于市。”后复恭假子颜博奔太原，收复恭骸骨，葬于介休县之抱腹山^{[16]4775}。同为养子，守立可负之，颜博却以忠孝之心待之。后梁朱汉宾与“朱友谦俱为太祖养子，而友谦年长，汉宾以兄事之”^{[17]496}。另外，隋末唐初，杜伏威起兵之时，屡为隋兵所败，养子王诞雄所救，有一次伏威败逃，“隋军追至，雄诞辄还御之，身被数枪，勇气弥厉，竟脱伏威”^{[16]2269}。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养父子关系并非都是利尽而断的。

三、唐五代养子现象的影响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养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有的从忠而终，有的却叛已投敌，有的相处融洽，有的却互相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以至引起战争，因此，不但对他们自身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对整个社会也造成了不可

忽视的影响。

(一)对养父子自身的影响

这一时期养子的大量收养主要集中在隋末唐初、唐末和五代时期，因为这三个时期都是政治动荡、战乱不断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军事将领、皇帝官僚收养假子大都是为自己政治目的服务的，虽然有少数是因为自身孤苦而被收养，或者为了传宗接代而收养等等，例如：后梁的朱汉宾，他的父亲战死，梁太祖“以其父死战，怜之，以为养子”^{[17]496}。但多半都是因为“爱其才、爱其勇、爱其慧黠”才收养之，通过这一手段将大量的优秀军事将领纳入自己旗下，为自己效力，作为自己争夺政权的棋子。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他们之间的成败是有着一定影响的。例如：《新五代史》载“初，太祖起于云、朔之间，所得骁勇之士，多养以为子，而与英豪战争，卒就霸业，诸养子之功为多。故尤宠爱之，衣服礼秩如嫡。诸养子麾下皆有精兵，恃功自恣。”^{[17]150}还有李宝臣，“善骑射”，也算是一位勇猛之士，他追随安禄山背叛唐朝，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安禄山的反叛力量，增加了朝廷平定安禄山的难度，延长了平叛的时间。所以，这一时期的养父子关系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勇猛的忠贞之士可成就养父的霸业，而奸诈之士却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二)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收养现象政治色彩浓厚，给社会局势造成了影响。《新五代史》的作者专门列《义儿传》进行记载，对此现象的评价是：“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盖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将相，岂非因时之隙，以利合而相资者邪？”^{[17]1385}“世道衰，人伦坏”、“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从这些字眼可以看出欧阳修对此现象深恶痛绝。但是根据以上事例的分析，由于收养数量上有着差异性，多则成百上千，少则数十人；收养之后养父子兄弟关系的复杂性，有的肝胆相照，有的相互残杀，所以它的影响并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具有两面性的。

首先，隋末炀帝昏暴，大型工程不断，又三征高丽，使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时候像杜伏威“养壮士三十余人为假子”^{[16]2267}，高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16]2256}，另外还有窦建德等人都积极蓄养勇敢之士、养子或义儿，所养之士都尽心尽力为自己的义父效力，这不仅使各个起义势力不容易被剿灭，

反而让隋朝遭受更多的威胁和打击。同样唐朝中后期,惊天动地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从此衰落,安史之乱之主角安禄山“养同罗、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千人为假子”^{[9]h6414},可见安禄山已经将养子关系作夺取政权积蓄力量的主要手段,最终迫使唐玄宗抛下皇宫与大臣仓皇而逃。宦官杨复恭“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9]h5890},李希烈“养子千余人”^{[9]h3595}。这些人养子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所以,养子现象加速了改朝换代,有利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与制度。

其次,与以上所说的恰恰相反,在唐朝建立之

初,因为收养勇猛之士,使得起义军各方面的势力更加均衡牢固,不容易被攻破剿灭。在五代时期表现更为明显,通过收养假子加强自己的势力这一手段更加普遍。后梁朱温、后唐李克用、后周太祖郭威、赵王王镠、蜀主王建、北平王王处直等都收养了不同数量的假子,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位君主都难以快速完成统一,使得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延续了整整五十年之久。另外,这种并非亲属却最终像亲属一样想享受各种继承权的养子现象,引起了不必要的杀戮与战争,破坏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宗法制度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规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华阳国志.蜀郡士女[M].九家旧晋书辑本.齐鲁书社.转引于黄灿.试论秦汉的养子与赘婿[J].齐鲁学刊,1988(1):72-75.
- [3]陈寿.三国志[M].北京:线装书局,2006.
- [4]孟轲.孟子[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 [5]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9]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

Study of Tang Dynasty and Five Dynasty's Adopted Son Phenomenon

TUO Tian-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adopting children phenomenon originated from the though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lan, in th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people who had ulterior motives using t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win and expand forces, then formed a hitherto unknown general mood that was adopt children. This relation was mostly based on benefits, so it could cause fighting easily because of power and benefits. But there were also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sacrifice for their adoptive father. This complex relationship not only had an effect on their success or failure, but also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whole society, on the one hand, it expedited the process of dynasty chang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hindered the pace of the new dynasty to complet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Key words: adopted son; source; relationship; influence

(责任编辑:董应龙)